

# 新方位·新作为·新力量

## ——2023年“中原五省博物馆教育培训”综述

刘璐

日前,由河南博物院牵头,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山东博物院共同主办,洛阳博物馆承办,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协办的“2023年中原五省博物馆教育培训”在河南洛阳成功举办。活动得到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博物馆学会、洛阳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本次培训以“新方位·新作为·新力量”为主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解读研讨国家文物局关于博物馆教育的新要求、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新定义、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及《中国博物馆协会助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与当前和未来博物馆教育的关系,在凝聚共识、加强互动的同时,找准博物馆教育的新方位、实现博物馆教育的新作为、展现博物馆教育的新力量,更好发挥博物馆教育在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美好生活的文化价值。

培训汇聚来自中原五省50余家博物馆、纪念馆的近80名博物馆教育管理和专业骨干,是中国博物馆界就教育专题开展的跨省区培训,采取专家授课引领、学员交流研讨、实地观摩教学等多种方式进行:在专家授课环节,三位特邀专家学者分别通过线下、线上模式发表主旨报告: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专家、深圳博物馆馆长黄琛研究员以《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题,结合深圳国有博物馆场馆建设及事业发展,引领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们放眼全局找准方位,积极探索如何盘活国有博物馆资源,激发国有博物馆创新活力。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果美侠,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文物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博物馆儿童教育的有效载体“绘本”创作,以《博物馆教育与价值传递》为题,以故宫博物院系列绘本成功策划与推出为例,进行了生动阐释。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奕围绕《博物馆如何制定“大教育”战略规划》主题进行线上授课,针对展教活动策划与实施存在问题,探索制定“大教育”战略规划以实质性提升博物馆的展教结合水平。3位专家学者的主旨报告理念新、维度广、站位高、前瞻强,参训代表们纷纷反映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使大家明确了新的前进坐标和方位,并具有启迪未来的新力量。

在学员交流研讨中,来自洛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山东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等单位的发言代表,先后



结合培训主题和工作实际展开分享。洛阳博物馆教育员、助理馆员李晨飞以《创新社教发展途径 赋能洛博高质量发展》为题,介绍洛阳博物馆以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从新趋势、新技术着手,创新社教发展新途径,激发“东方博物馆之都”新动力。山西博物院教育员、馆员徐晓娜以《拓展研学深度 释放博物馆教育新活力》为题,通过拓宽研学广度、细化研学深度、提升研学温度三方面的实践,推进研学中“研”的深度与力度。安徽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副主任王毅以《博物馆里的“新青年”》为题,提出新时代博物馆教育工作要始终坚持以“新青年”的独特视角和活跃思维,常保思想、行动、实践之新,推动博物馆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山东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孙友德以《博物馆研学的价值与路径走向》为题,展示山东博物馆针对研学新路径的实践与探索,融入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实现展览与研学教育同频共振等。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助理、馆员赵小蛟以《用新文创拓展新空间——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再延伸》为题,以河北博物院开发的战国中山服饰复原项目为例,介绍在特色文物资源的研究挖掘、科学阐释、创新表达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结业仪式上,河南博物院党委副书记、河北博物院副院长武彦平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丁福利代表主办方做培训总结,对培训进行了回顾与述评。他认为总体上看,这是一次高质量的成功的培训。表现在主题聚焦、亮点纷呈、气氛热烈、效果鲜明,从专家授课内容到学员的案例交流研讨,有高度、有广度、有精度、有

温度。丁福利希望全体参训代表们回到工作岗位后,尽快结合实际做好培训成果的转化工作,找准博物馆教育的“新方位”,努力实现“新作为”,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释放出博物馆教育的“新力量”。

中原五省博物馆教育培训,是河南、山西、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博物馆教育联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品牌合作项目,业界普遍认为其树立了跨省区人才培养和专业交流的合作标杆。该合作机制2015年定于河南信阳,2016年签约于河南南阳,2017年成长于河南南阳。此后,在河南博物院提议下开启轮值模式:2018年成熟于山西太原,2019年升华于安徽合肥,2020年拓展于山东济南,2021年接续于河北保定。从始至终,时刻聚焦国家战略、跨区域和社会的发展热点及博物馆学社会教育专业领域的发展前沿,紧贴时代脉搏、顺应并引领着博物馆发展的主流与新趋势。8年来,中原五省博物馆教育培训的历次主题切合博物馆的使命责任,在成功促成五省博物馆教育大培训、大练兵、大交流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五省博物馆教育人才培养,促进了参训单位博物馆教育工作的互动共赢,在国内博物馆精品课程和优秀案例评选中屡获佳绩,让五省博物馆的教育品牌结出丰硕成果,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让五省学员在认真学习、凝聚共识、加强互动的同时,立足自身实际、更新教育理念、收获更多新知,在今后工作中更好发挥博物馆教育在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文化价值,持续为五省博物馆教育的互学互鉴注入新的活力。

据悉,2024年中原五省博物馆教育培训将由山西博物院牵头主办。

# 明中都午门须弥座:一座被忽视的明初纹样宝库

张金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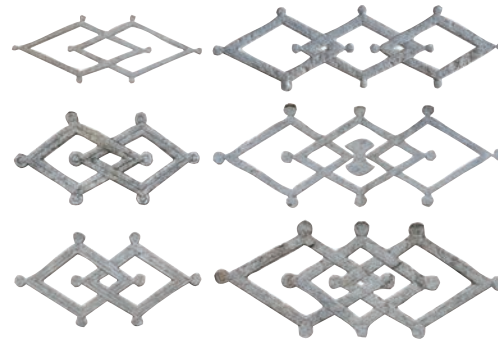
明中都午门(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站在明中都午门前,面对它的残缺,人们可能会想起北京故宫午门的完整和宏伟,因而会唏嘘感叹时间对于它的摧残。但如果我们将视线稍稍下移至须弥座,就会暂时忘却遗憾而惊叹于它依然存在的别样美丽——长达370米的11种421个纹样。这些纹样不仅佐证了明中都“雕饰奇巧”的文献记载,也具体而微地体现了古代帝王在建造宫殿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之”的心思。

明中都午门须弥座束腰处纹样雕刻于明洪武初期,包括了方胜纹(183个)、缠枝纹(59个)、折枝纹(44个)、梅花结带纹(36个)、万字纹(31个)、云纹(22个)、凤纹(20个)、龙纹(14个)、双狮戏绣球纹(5个)、双鹿纹(4个)、麒麟引凤纹(2个),辨识不清(1个)。1975年王剑英发表的《明中都城考》,使得这座被遗忘的都城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书中,王剑英对午门须弥座部分纹样做了简单的记录。此后,也偶有学者做过一些相关研究,但很遗憾它一直未能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本文以万字纹、梅花结带纹和方胜纹为例,对其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初步注解,以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

不明显;(6)前者的“带”尾部只有一个或者两个“钳把”,而后者则大多不止这个数量。相同之处则在于A型梅花结带纹均位于一面墙的端部,而B型位于中间部位。同时,相交两个面的A型梅花结带纹形成转折90°的B型梅花结带纹。梅花结带纹的寓意可能有力学上的拉结作用,以确保须弥座的整体完整性和稳定性。

### 方胜纹



明中都午门方胜纹

方胜纹主体结构为两个菱形压角勾连相叠。一般认为“方胜”是从西王母的发饰“胜”演变而来。在有关西王母的早期文献中,如《山海经》《大人赋》《汉孝武故事》《博物志》《真诰》和《茅君传》等中均有西王母“戴胜”的描述,但都未提及“胜”的具体样态。汉代画像石中开始出现西王母戴“胜”图样——横梁连接两个蝴蝶状物。

在目前所能看到的西王母图像中,除了“戴胜”这个特征与《山海经》记述吻合之外,“豹尾”“虎齿”和“蓬发”的特点则几乎全无表现。大概也因此,出现了以“胜”代替西王母的现象,而“胜”也因为西王母信仰而有了各种不同的神异功能。“后母桓式,梦吞玉胜生后。”“世无盗贼凶人,则金胜出。”“金胜者,仁宝也。不琢自成,光若水月,四夷宾服,则出。”汉朝后期,西王母图像的“胜”形状有了变化,出现了像花朵一样的“华胜”,且已经戴在了人的头上,之后逐渐成为民俗——“正月七日为人日……亦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再后来,“胜”的前置修饰词不断扩充,出现了根据材料取名的玉胜、金胜等;根据形状取名的华胜、人胜等;根据节气取名的春胜等等。可见,“胜”的意义已经泛化。同时,这些“胜”大多是选取最具典型特征的蝴蝶状端部,而省略了中间的连接横梁——“仗”。

在各种形状的“胜”中,“方胜”在后代有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方胜”这一名称被认为是中心词“胜”加上修饰词“方”构成。单就视觉对形状相似的评价来说,蝴蝶状的“胜”和两个菱形压角“方胜”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很难将两者实现自主的关联推演。由于方胜这种几何纹样的抽象性,再加之文献及文物的缺失,从而使得清晰的溯源几乎不可能。目前研究的前提通常都是承认“胜”是“方胜”的原型,然后从“方”字进行解释。至于“方”字的释义,一般也是取谨慎的《说文解字》,“方,并船也,象两舟省,总头方。”也有学者虽然认为这并非“方”字本义,但也认可“方”为“并列”的意思。由“胜”到“方胜”形象上的转变目前尚未见更进一步的研究。古代中国有以“双”指代阴阳、天地、男女等相辅相成事物的思想,因此方胜纹中两个同构菱形的重复及交叠,也被用来指代“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寓意,如《西厢记》中“把花菱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而“胜”所具有的神性则似乎消失了。方胜纹样在元朝时期的频繁应用主要依托于八宝纹,而在明清时期,方胜纹除了作为平面的吉祥图案应用外,还出现了方胜瓶、方胜盒、方胜盆、方胜柜和方胜亭等立体造型以提供使用空间。

在明中都午门纹样中,183个方胜纹、166个二连方胜纹、17个三连方胜纹以其数量上43.5%的占比优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一般来说,方胜纹中两个压角勾连相叠的四边形应是菱形,在严格设计的情况下,一个菱形的压角处还应在另一个菱形的中心位置。但明中都午门须弥座方胜纹则呈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只能说是“四边形压角勾连相叠”。同时,在纹样的各个细节处也有不少差异。比如:(1)角点形状不同:钱纹、两同心圆、两非同心圆、三非同心圆和单圆;(2)菱形内线条数不同:无线条、1条线和2条线;(3)压角相叠方式不同:左压右勾连、右压左勾连和叠压;(4)三连方胜纹中,两侧菱形在中间菱形的连接方式不同。

### 小结

传统纹样承载着先辈情感意识、理想愿望、审美趣味以及人文情怀等丰富内涵,是根系相连的文化身份认同符号之一,但其认知缺失是目前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中都午门作为难得的一座明初纹样宝库,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为什么纹样种类如此之多?这些纹样选择的重点考量是什么?为什么同类纹样没有显示出统一性?为什么万字纹是分布在东西两观?为什么方胜纹会成为优势纹样?等等。需要我们努力探寻其渊源及寓意,以期能在今天建立起与过去的联系,并在未来进行延续和扩展。

### 万字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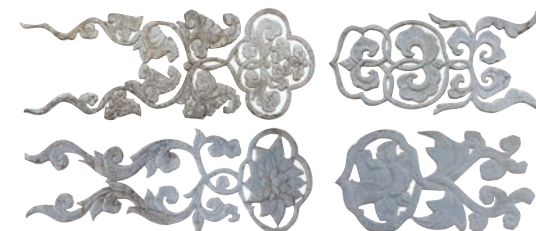
明中都午门万字纹

万字纹是指形如“卍”或“卐”的单独或连续纹样。万字纹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亚洲的北半部,北纬40度一线呈东西走向的东亚、中亚狭长广袤的草甸地带。万字纹作为历史久远但点状延伸、广泛分布但现存零星的世界性纹样,追根溯源及厘清发展脉络是很困难的事情。

在我国,万字纹最早出现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主要以马厂类型为主。马厂的万字纹集中、数量多,基本图式一致,但具体细节差异较大。大约同时期及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万字纹在其他地区或文化都比较罕见,仅有零星发现。同时,甘青地区在这时期之后也少有发现。汉朝时佛教传入后,作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一的万字纹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而逐渐被我国人民所熟悉并接受。但最初,它只是一个符号——“吉祥喜旋德相”或“吉祥相”。之后,大概是因为“卍”与“万”字的俗体“卍”形体相近,人们开始用“万”来指代“卍”,而由于“万”字所具有的“极多”的含义,使其经常和“福”“寿”联系起来,“卍”也就逐渐部分地脱离了宗教的含义与束缚,从符号转变成为具有特定音形意的汉字。不管其最初的指代为何,万字纹在我国最终形成了在时间上延续永久,在空间上拓至无边,在数量上繁多无数的独特含义,从而世俗化为一个传统的吉祥和审美对象,并被广泛运用到包括建筑、器物、家具、织物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历史上曾存在“卍”和“卐”的争论。在康熙字典中,也只有“卐”而没有“卍”。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的17个“卍”和14个“卐”,不仅表明万字纹在明初是一个被皇家接受的纹样,而且也说明,至少在明初时,“卍”和“卐”是具有同样吉祥含义的图案,而无对错之分。

### 梅花结带纹



明中都午门梅花结带纹(A型)

“碗”“盃”“罍”和“碗”为异体字,本义是小型盛食器。如:《世说新语·排调》:“王公举琉璃碗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北史·卢叔彪传》:“食至,但有粟食羹菜,木碗盛之。”1955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取“碗”为正品。因此,“梅花结带纹”是“碗花结”“带”“纹”,意思是“如‘碗(碗)’里有‘花’的‘结’,这个‘结’还附有‘带’的纹样”。

明中都午门的梅花结带纹有两种,一种是由卷草纹形成的如意状“碗”加向一侧延展的“带”,定义为A型,32个;另一种是由卷草纹形成的各种形状的“碗”加向两侧延展的“带”,定义为B型,4个。它和其他的明清宫殿和陵寝建筑须弥座中的梅花结带纹有较大差别:(1)前者每个纹样各具不同形状,后者至少在同一建筑中会显示出同一性;(2)前者的A型纹样中,“碗”里基本都是具象或抽象的“花”,而后者则大多较难辨别出“花”;(3)前者的B型纹样中,在“碗”的部位很难看出和A型纹样的关系,而后者则可以明显看出是由两个A型“碗”勾连而成;(4)前者的“带”明显是“卷草纹”,而后者则是“绶带纹”;(5)前者的“带”尾部均是“钳把”状,而后者则这种特征很

# 盘龙城出土文物首次走进二里头展出

甘婷婷 赵腾宇



展出文物“绿松石镶嵌金饰件”



展出文物“带盃觚形器”

日前,由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商邑金戈——盘龙城青铜文明陈列”展览在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下简称“夏博”)开幕,展览共展出各类代表性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陶器及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等文物131件/套。

展览分三个单元,从遗址发掘、考古成果以及地理区位三个角度,向观众讲述盘龙城遗址的故事,描摹盘龙城远古的生活面貌。第一单元“涛起城池”,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武汉周边的一场洪水使古城被意外发现,大规模考古发掘介入,揭开了盘龙城遗址的神秘面纱。第二单元“熙然风物”,汇聚了盘龙城遗址数十年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重要成果,以珍贵文物和沙盘、投影、视频的集中展示,为观众打开一幅盘龙城城市建设、建筑营造、人民生活、劳动生产的宏伟画卷。第三单元“卓卓商邑”讲述了盘龙城的兴起过程及其优越的地理区位,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盘龙城这座“大都市”在商王朝的重要地位。

1963年,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开始考古发掘工作,其规模宏大,至今已经历了60个春秋。遗址目前已发现有城垣、宫殿、贵族墓葬及手工作坊等重要遗迹,且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陶器,带给人们更具体的商代文化信息。据了解,此次盘龙城遗址出土文物是首次大规模走出湖北,走进二里头,其中不乏备受关注的代表性文物。如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带盃觚形器”,其造型独特,器身内部为扁圆形的空腔,可装约440毫升的酒水。器物整体造型兼具了觚、盃、角等青铜器器的部分特征,左右对称,富有美感,体现了盘龙城先民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特征。

同时,此次展览也促成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在同地“对话”,形成对比和共鸣。如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绿松石镶嵌金饰件”,其文物主体以绿松石片镶嵌贴塑,眉毛、眼睛、牙齿、颌骨、额饰由金箔片装饰而成,绿色的玉石和金色的黄金相互映衬,是盘龙城首次发现的金玉镶嵌饰品。它与二里头出土绿松石文物有

着隐隐相似。夏博党委书记、馆长赵晓军表示:“早在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文物,其工艺和造型风格被商代的盘龙城遗址所继承。如今,通过展览两地再次联系在一起,进行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对话。”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繁荣相交,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载体,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规制、宫室制度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此次展览,观众可以更好地认识以中原地区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不断走向融合的发展过程”,赵晓军说。

莺飞草长的时节,此次夏博2023开篇首展获得了观众的肯定。据悉,开展短短一周内已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提供免费讲解20余场。近日,夏博联合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和地方媒体,先后开展了2次线上直播活动,在线为观众解读盘龙城遗址的前世今生。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5月23日。